

政协文史资料

(一)
(总第三期)

政协蓬溪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5年 3 月 1 日

目 录

蓬溪县政协召开首次文史工作会议.....	文史组
引言.....	文史组
回忆吕玉堂、庄克明先生二三事.....	庄济华 (6)
中医郭受先先生传.....	罗继光 (10)
	谢世海
李时珍在蓬溪做过知县吗.....	赖显荣 (15)

蕲春县政协文史组于去冬召开了首次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有政协副主席张英、易崇荣、杨洪珏、庄济华，副秘书长李光辉、刘茂国，专职常委杨洪翔、黄天佑、胡儒仲，县委党史办张茂琛，对台办夏嘉福，县府县志办冯光荣，商业局廖琦，乡镇企业局廖晓芳，体委何志亮等负责同志和文史组成员以及特邀各界知名撰稿人王其斌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县政协委员、文史组副组长冯光荣同志主持，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杨洪珏同志讲了话；他对人民政协征集文史资料的重要性、紧迫性、方向、特点、任务、要求以及开展文史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必须解除的一些顾虑作了说明。会议还学习了全国政协、省政协有关文史资料的工作文件和部份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根据我县实际和人民政协的特点修订了“文史资料征稿目录”，研究了撰稿项目、对象，进行了分工，题目落实到人头。

大家通过学习讨论，深受启发，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和要求，对开创人民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首先，明确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会上大家共同认识到，文史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爱国者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

人民、教育人民，激发人民爱国之情，报国之心，建国之志的千秋大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是推动我们伟大祖国历史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促进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信仰的人民团结起来，是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思想基础，“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邓颖超主席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要看我们征集出版的资料，对于爱国主义，对我们的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后代是不是有利；我们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就可以广交朋友，扩大征稿范围，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就可以发挥文史资料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要对人民、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必须认识祖国，通过对祖国过去是怎样贫穷落后，连年内战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以及人民如何英勇顽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来认识旧社会，大家都是阅历丰富，知国情、知县情、知乡情，都表示愿意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事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上对祖宗负责，下对子孙造福。

其次，进一步认清了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学习大家共同认识到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它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存真、求实”的原则，都应该尊重史事，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改变，不管写入写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人也可能做些坏事，坏人也可能做些好事，我们便应该把好的坏的都写出来，寓褒贬于史实之中，我们不妄加观点作结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人民政协征集、出版文史资料，主要是指近代史、现代史和

革命史，也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事、记当代“帐”，这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和重点，所以必须就其亲历、亲见、亲闻秉笔直画，不隐恶，不溢美，不讳尊，不讳贤，不讳亲，不能人微言轻，人显言贵，更不能因人废文。

第三、当前，要广征博采，重点抢救，大力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在方法上应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可以走出去，请进来，因人约稿，命题访人，也可以组织专题座谈，集思广益，互为借鉴。在组稿体裁上，一般采用记事、叙述体，文言、白话均可，长短不拘，允许多说并成，百家争鸣，不搞一刀切。对于来稿，坚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凡是刊用的史料、文稿，酌付一定的稿酬。

引 言

蓬溪地处川北山乡，人文史迹逊于兄弟诸县，然则蔓草蕃芝，地灵化育人杰。牛尉李君著灵不朽；冯仙贾簿留胜未湮。旷继勋举义旗于大石桥，成立川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白莲教屯兵于跪象山，点燃农民起义火种。瘦诗亭遗址，明月掩映风流可师；古客馆流芳，浣芝溪畔赤霞蔚起。前人业绩勋劳，存于《志》者庶可传诸百代，有不存于《志》者，岂可让其湮没？建国三十五年，我县文史毁于“十年动乱”之中较多，泛存的口碑有待及时抢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赶编文史资料则是我县政协的宗旨和任务。纂写文史资料，用以填补史志之不足，并为研究历史，解剖社会，教育后代，繁荣科学文艺，加速“四化”建设提供详实参考资料。不可讳言，这是一件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

编写文史资料，任务艰巨，工作繁重，有赖于社会各方的通力合作。为此我们热切希望革命前辈、爱好文史的同志和各单位、各界人士惠予赞助、支持并踊跃投稿。约稿要求存真求实，不拘体裁，秉笔直书就可以了。稿件一经刊用，即酌付稿酬。

现在初刊三篇资料（初稿）编为一辑。由于资料所涉及的事件比较复杂，同时因时间的推移，人事的代谢，采访、调查、核实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以我们初次从事这项工作，差误在所难免，其失真、遗漏、偏颇之处，欢迎增补、订正。

政协蓬溪县委员会文史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回忆吕玉堂、庄克明先生二三事

庄济华

爱科学爱藏书各有千秋

受压抑受欺凌大同小异

吕玉堂（1883—1950）、庄克明（1883—1947）两位先生的一生，确是旧社会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缩影。

他两人都酷爱教育事业，在赤城附近地区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或早或迟（如杨洪珏、李清儒、段大块、段二文、胡代清、王泽贵、吕光昂、陈光前、王守华等等）都是他们的“蒙童生”；包括颜守恂、谢树轩、巫崇光、庄孝移也受过教。可是，虽有育才之功，却因社会上莫名其妙的风浪，加上政治余波，不在“六腊战争”中败阵下来，而是被迫害，忍痛离开了文教界。他两人都酷爱科学与文史，吕玉堂先生可算是一位“天文迷”，在那种极端窘迫境况下，他购置了很多器械与仪表，从“日晷”到“黄道仪”都应有尽有，据我知道，大多从当时“商务印书馆科仪部”邮购，部分是“科仪公司”——当时属于“中国科学社”函购托运来的，还有些是他亲手制作的。吕玉堂先生精通历法，据说他曾指导吕光昂写有本“改革历法”的著作，很有见地，可惜此书不知后来如何。庄克明先生却算是位“藏书迷”，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几家大书店出版的书几乎应有尽有，从“绕装古本”到“精装巨册”，从经史子集到天文数理无所不包，1946年准备“后事”我帮他清理，记得有十二万多册，比如他藏的数理书籍，有“直排古本”，有“横排今本”，王兼善

的“老化学”，郑贞文的“新化学”都被收藏着。

他两人都热爱祖国和祖国文化，都不随波逐流，都爱纠正人家的差错谬误致使某些“名流”下不了台。这样就被“正人君子者流”目为书呆子；更有甚者，还曾被戴上过美丽的红帽子，幸好当时他两人年事已高，查无实据，虽受囹圄之惊，还未被送掉脑袋。

他两人共患难、同命运，一直关系密切。在清末年间，他两人是“学衡”（相当于现在文教局局长）樊宗源先生的得意门生，同“去潼川府”——即三台考秀才未中，便由樊先生保荐去南充进张陵主办的新学堂（顺属中学或嘉陵中学），后因家境困难，两人退学回来，又去成都考入“新军”，半年后转入“师资班，反正（即清朝灭亡）之后，两人同回县来“团馆教学”，后来赤城办万寿宫小学便聘了他两人任教，直到1939年左右，颜守恂回县来主持国民党工务之时，这位“高足”以“整肃教育、强化党政”为名，把两位“蒙师”撵出了这所学校。

指错别指漏洞遭受忌刻
说实话说国耻飞来横祸

这是吕玉堂先生讲出来的。

颜守恂以国民党党官身分初回蓬溪，还摆了一幅“尊老敬贤”的架势，做起虚心请教的姿态。这位以“名流”自诩的党官，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说错别字，逻辑思维也漏洞百出。有次在代应“佛教学会”上，颜守恂把“皈依我佛”说成了“板依我佛”，把“圆寂正果”说成了“园叔正果”，把“破绽百出”说成了“破定百出”，最成笑料是引马援那句“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葬”说成了“马革裹尸”等等。吕玉堂先生即席指出纠正，又扩散在群众中成为笑柄，使颜守恂为此大为恼火，忌刻在心。

吕玉堂先生被国民党政府捕捉过两次：早一次是因为南充那边的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吕氏弟兄被捕案”（指吕××、吕范山被捕事件）受同宗姓氏的牵连；另一次就是为宣传“国耻”有罪而被捕的。两次年代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起头一次释放时放鞭炮我去参加了欢迎行列。

这两位长者确是诚信待人，说实话做实事件件都以身则作。郭汝成先生写的《国耻小史》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刚运来蓬溪销售，他两人便去购置人手一册，用来向学生作讲国耻的补充教材，这事不知为何迁怒了一位“抗敌动员会”的官员（记得这个单位挂了牌在现在的蓬溪中学体育场上端，先是挂的“新生活运动会”那幢平房外，叫他两位去“质问”，事后吕先生才谈出那次动人的“会见”。质问者劈头就问“你知道郭汝成有异党嫌疑吗？”吕答不知道，并反问“为什么？”；质问者说是“郭汝成不嫖不赌不吸烟，写书读书那么展劲，不是异党是什应！”吕笑问“未必嫖客、赌棍、烟鬼和不学无术才是天大的好人良民？”争执一阵不欢而散，临走时却受了“注意打点”的警告。两位老先生就这样因宣传国耻被“动员”出了教育界。

吕玉堂先生一生出书出力各尽所能，郭汝成先生一生克勤克俭默默无闻。

从这两人生活上的刻苦、事业上的专一，确有中国知识分子特具的性格。他两人晚年只有在赶场天聚会于荣肆酒店之中，谈论他们间的治学心得和宏伟设想。据我知道，吕玉堂先生出力整理庄克明的藏书，拟出计划打算，对《皇朝文献通考》进行校正编目；对历代自然科学的异名同物及同名异物进行校正，对这工作当时我很感兴趣，特别是葛洪炼丹的所用原料名称与近代化学品名的异同考证，

我还寄给一些资料供他们参考，可惜没有完成，资料也不知下落了。

1946年底我帮庄克明先生清理藏书，还发现了吕玉堂先生在不少书里卡了“签注”的纸条。这批书在出卖给当时的抗建中学时，我曾给罗绍进先生与冯楚天先生建议，把那些签注纸片收起来，不要失散了，人家心血劳动的成果，尤其那样困难条件的成果，毁了可惜。以后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那样的社会条件，各人为生活迫于奔命，两位先生克勤克俭一生，努力钻研一生，不仅默默无闻，还不为人们所理解。这事每一忆及，旧社会的惨景岂不令人不寒而慄么？

1984、6、20、

中医郭受先先生传

罗继光 谢世海

中医郭顺忠、字受先，晚年人们尊之为“寿仙”，是四川省蓬溪县天福乡米丰坝人。生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丙午，九月九日重阳节。是郭赐海老先生长子，著名老中医郭赐富老师的胞侄和高足。

先生从十四岁起从事医业。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要方》、《六科准绳》等名著为主，兼及各派。刻苦钻研，孜孜以求，故能通晓各派学说，博取诸家精义。去粗取精，避短扬长，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实际运用，有独特的见解。临床诊病，周密细致；处方用药，严格谨慎。常对人说：

“病有十分，用药只宜八、九。药若猛下，犹如洪水决堤，病虽治愈，病人的元气却受到了较大的亏损；用药和缓，病人的元气不致大伤，易于恢复”。先生治牙病，往往加上牛膝或碎补，问其因由，他指出：“先天之本主肾，肾主骨；牙齿是骨，用此药以固其本！”先生治老年体虚和脑力劳动的病，多以参芪术加健脾胃之药味，特别是对后者，有精辟地阐述。他以为脑力劳动者，一是说话多，耗津液；二是熬夜多，致阴亏。先生对肝硬化常以民间验方治之。他往往劝病者用鸡屎藤一斤，隔山撬一斤，鸡内金二两为末，和糯米作成油酥面常服。对老年中风者，多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主之。如射洪县青堤乡的百岁老人杨兰轩，因中风不起，先生以为年事太高，它药难治，运用此方，病者连服三剂而愈，直活到一百零七岁。五

星乡三大队病者李笃光，六十四岁，因中风，先生也以其方愈之。对患肾囊风者，令其用鲜紫苏搽患处，莫不立见功效。先生于常见病、多发病，如大人、小孩所患的肠胃病，先生多以平胃散为主，根据病情轻重，体质强弱，四季气候，予以增补删减，病者服之，真是药到病除。因之，远近求医的人，日不暇接。

先生以济世活人为怀，以治人之疾为务。凡有求于者，先生总是不计途程远近，不避风雪严寒，不论深更半夜，不分贫富贵贱，无一不是有请必到，有求必应。特别是贫穷人请他，一请便到。不仅不收诊费，而且还免费给药。解放前，有一乞丐患病，先生听说，亲身前往。既与之诊病，又送药费。愈后还给肉吃。先生以精湛的技术，高尚的行为，受到远近的人民群众交口赞誉，故称之为“寿仙”。

先生医术虽精，但家境清贫。身居竹篱茅舍，仍是佃户人家。尽管如此，济困扶危之心不衰。无论亲戚邻朋，或非亲非故的贫穷人家，他都乐于资助。即使自己不吃，也要让饥饿者有吃；纵然自己无穿，也要让无衣者有穿。先生为人温良恭俭，仁慈厚道，因而受到远乡近邻的尊重，贫穷疾苦者的敬爱。

先生不独精于医道，而于文学尤其渊博。从小就天资颖悟，思虑敏捷。三、四岁时便能背诵唐诗，七、八岁时便能吟诗作对。凡有所闻，莫不对答如流，因而有神童之誉。九岁从塾师学，所读之书，过目不忘。学业精进，使人钦羡。时或提问，老师也难解答。稍长，喜好古文。上至周秦汉晋，下至唐宋元明清。诸子百家，莫不毕览。诗词曲赋，无一不通。下笔行文，文思泉涌，体例得法；吟诗作赋，音韵合律，词语绝妙。同辈们钦佩，师长者惊叹。及后仍好学不倦，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常是秉烛夜读；医学书籍，如《生理卫生》、《人体解剖》、《动物学》、《植物学》，以及达尔

文的《进化论》，无一不潜心研讨，真是一位勤于学、精于业的好儒医。

先生重视培养人才，奖掖后进。因此，同辈人与后生中，凡仰其医道者、慕其文才者、重其品德者，无一不愿拜门求教。而先生却非常谦逊，莫不诚恳相待，并尽心地教导，精心地培养，使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长。他的学生中郭安先、郭前炆、郭泽民、何具丑、马敬龙，都是名重城乡的良医。其中郭前炆已是久负盛名的畜牧兽医师。继光以同门弟子关系，向他请教，先生诚恳相待，悉心指点，使我受益非浅；常乐名医银际昌、银际达两先生，与先生虽非同师同门，但为了医术发展，救人有方，他们经常进行互相质疑，互相探讨，结成了亲如手足，义胜同胞的亲密知友。世海因笃好文学，常向先生求教，感先生开化愚蒙、精心诲导，由之结成了不是师生胜是师生的深厚情谊。同乡青年，有志于学的艾正全，上初师读书经费有困难，先生不但竭力相助，并在亲友之间与之募资义助。使艾生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人才。

先生热心公益，乐尽义务。解放前竭力筹办崇德堂，组织医药界的好心人给贫苦人家义务治病，并送给药救活的人不计其数。为了提高救人的医术水平，先生首倡创建了医学研究会，并被推为董事长，定期召开中医学术研究，临床经验交流会议。先生总是亲自主持，带头发言，使当时的医务人员理论水平、业务能力都有普遍地提高。由于先生高风亮节，淳谨敦厚，又被推选为蓬溪县中医师公会天福场分会的常务主任，以及中央国医馆四川省蓬溪县分馆、蓬射联合区支馆馆长等职。他事事认真负责、处处竭力尽心，使日益衰落、濒临绝灭的中医事业，得以幸存，得到延续，得到发展，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

解放后，由于党对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视，特别是对中医中药发展的重视，先生深受感动，深受鼓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国家处于新生阶段，百废待举之际，先生以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来感谢党关心人民健康、关心中医中药事业，于1952年积极联合几位中医自筹资金，创建了天福乡益群诊所。一则方便人民群众就近治病；一则为国家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开业之初，有郭义忠、甘明华、郭安先、唐茂森、何丹池等医师；有甘大田、丁仕清、尤发洪、宋代齐等少俊。后来诊所扩大，转为五星区医院（即现在的天福区医院），先生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

十年浩劫，“四人帮”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先生虽也身受其害，但治病救人之志毫无退减，仍然参加卫生界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1980年，先生出席县名老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经验交流大会。因在县委招待所与诸同志慢步庭院，交流经验时，不意增埏石滑，先生以滑跌致伤，从此卧病，终因年老体衰，至一九八一年（辛酉）夏初寿终，享年七十六岁。

先生幼年丧父，事母至孝；对两弟一妹非常友爱，二弟安先是先生亲自授业、亲身培养，成为名重乡里的良医。三弟体忠，由于先生竭力供给，专科学校毕业，成为南充织绸厂厂长，党委副书记。妹已婚于唐氏，也是先生一力扶养成人的。

先生夫人姓罗，虽属农村妇女，但知礼仪、明大义，甚称贤内助。

先生有子五人，均俊伟有声。长名孝儒，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现任大学讲师，有不少专著问世。二子孝伯（别名应祥），中师毕业，曾作小学教师，不幸过早屈死于“右派”。三子孝传（又名昌荣），大学毕业，现任某工厂技术员，长于化工。

四子孝杰、五子孝伟，是先生口授心传，少年有成的有名中医。他们都能继承父志，克尽父职。孝杰在天福医院任中医；孝伟行医于乡里，均颇有声誉。

先生一生淳良致厚，勤奋谨慎。常以济世活人为怀，救死扶伤为念。学识渊博，医造精良。为人正直忠厚，做事光明磊落；急公好义，高风亮节；奖掖后进，诚挚谦逊。是同辈人之楷模，后辈人之典范。于国于人，贡献巨大，真是一位受人尊敬，受人怀念的好中医、好老师。

李时珍在蓬溪做过知县吗

赖显荣

李时珍是否在蓬溪县做过知县？这个问题历史上本来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包括《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历来是没有争议的。可是，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本草纲目》影印本的问世，却有人据此认为李时珍在蓬溪做过知县。还有人为此查阅了《本草纲目》后，赞同上说，认为它在文字上肯定了李时珍在蓬溪做过知县。笔者认为，这是他们的误解所致，现就这个问题探析如次。

李时珍一生来过四川没有

据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三十八）·李时珍传》（1704年），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九列传一八七）·方伎传·李时珍传》（1731年），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五序传）·李时珍传》（1795年），封爵初重修《蕲州志（卷十一）·儒林·李时珍传》（1882年），英启《黄州府志（卷十九）·文苑·李时珍传》（1884年）【注】等历史资料的记载，现将李时珍一生的主要经历综合简介于下。

李时珍，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湖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岁次戊寅（1518年）。家庭世代行医，祖父为铃医（即串铃走方的郎中），父亲李言闻，是当地的名医。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李时珍应童子试，考上蕲州州学生员（即诸生，亦称秀才）。以后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遂弃

儒随父学医。嘉靖二十年（1541年）正式行医，行医十年，治愈了不少疑难重病，名噪一时。嘉靖三十年（1551年），楚王府奉聘为祠正，掌管良医所事务。他在楚王府任职共五年多，楚王朱英烜的世子（嫡子之受封者）“暴厥”，被他治好了，于是，声名大震。当时礼部令各地举荐名医到太医院补缺，楚王遂向朝廷举荐李时珍，明世宗授给他“太医院判”的官职（明制，太医院设院使，佐为院判）。李时珍任职一年多，因志在修《本草纲目》，就托病辞去了职务，以便周游各地考察医药。

李时珍在任楚王府奉祠正的第二年（1552年），就开始着手修《本草纲目》，在太医院任职期间，仍未间断。辞去官职以后，沿途考察了北方各地的草、木、虫、鱼和各种医学典籍，最后才回到家中。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十多年中，他带上徒弟庞宪和次子李建元，多次到外地采集药品，实地考察。先后考察了蕲州北的龙峰山，湖北西北的太和山（即武当山），江西的庐山，江苏西南的牛首山、茅山等名山，到过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本草纲目》修成，李时珍刚好满六十岁。此后几年中，《本草纲目》在一些友人中传阅，备受称赞。后来，李时珍又携《本草纲目》亲赴江南太仓（今江苏省太仓县），请著名文豪王世贞审阅。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王世贞给《本草纲目》作序。同年，《本草纲目》开始刻印，书还未刻完，李时珍便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六岁。李时珍共有四子，长李建中，次李建元，三李建木，四李建方。

纵观李时珍的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两岸，但就是没有“入剑门”，“过三峡”，更不用说来蓬溪了。

“蓬溪知县”的由来及其真实含义

以上各种历史资料，均未提到李时珍任过“四川蓬溪知县”，“蓬溪知县”的官衔，仅见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印完毕，书中提到“蓬溪知县”的有三处：

一、第一卷《序例·历代诸家本草》中，于“本草纲目”条下载：“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壁撰。”

二、卷首载湖广黄州府儒学增广生员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云：“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

三、附图卷之首上，署云“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编辑”（见《中医杂志》1959年4月号封三照片）。

以上三处，文字上基本相同，“敕封”即“奉敕进封”的省文。

楚府奉祠，即楚王府奉祠正。“奉祠”一官，来源于宋代，据《宋史·职官志十》记载，宋代五品以上官员，不能任职事，或年老退休，多被任为宫观使、提举、提点、主管宫观等官，无职事，但领奉禄，叫“奉祠”。在明代，“奉祠”是个谈不上品阶“无职事，但领奉禄”的小官。顾景星《李时珍传》、章学诚《李时珍传》均称：“楚王闻之，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说明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是掌管该府医务工作的。

那么，文林郎又是什么官呢？清代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载：

“文林郎，唐宋文阶官之制，从九品上曰文林郎，金升为正八品，元升为正七品，明为正七品升授之阶。”旧本《辞海》在“文林郎”辞目下也说：“隋置文林郎，为文散官，历代仍之。明清时为文职